

# 浅析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

李秉忠

**内容提要** 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是长期困扰该国政治生活的难题之一,对该国的内政与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该国的国家认同、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形成了不可小觑的挑战。在土耳其希望加入欧盟和库尔德人的诉求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得到欧盟强烈支持的背景下,该国境内库尔德人问题的未来走向显得愈发微妙。

**关键词** 土耳其 库尔德人问题 欧盟

一般而言,所谓的库尔德人问题指的是库尔德人为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主导下的中东地区领土的不合理划分,造成作为中东地区第四大民族的库尔德人现在主要分散居住在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等国境内,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无国家的民族”,他们寻求建国的愿望非常强烈。由于库尔德人特殊的历史际遇、糟糕的生存状况及中东复杂的政治局面,使得库尔德人问题备受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本文主要从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问题的由来、库尔德人问题复杂化的原因以及库尔德人问题与当下土耳其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即加入欧盟)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对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分析。

土耳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库尔德人群体,该国境内库尔德人的诉求从完全独立到建立联邦实体,再到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其在享有土耳其公民权的前提下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些权利,他们采用的主要方式是与土国政府军队展开长达十几年的军事斗争,“1983—2000年之间,因为安卡拉和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冲突,造成38000人员伤亡,25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sup>1</sup>足见其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库尔德人问题的长期性和跨国特点对土耳其的社会稳定、民族关系的发展乃至民族国家的整合及地缘战略都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土耳其就像一棵树,根部深扎于土耳其文化和不同的民族之中。在其幼年时期,它被控制着向一个方向——土耳其的方向发展生长。而在其青年时期,它的枝叶倾向于各自发展,寻找自己的光源。”<sup>④</sup>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土耳其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指出了土耳其国内的国家认同(土耳其认同)与各种社会认同(如伊斯兰认同、库尔德认同)等之间出现的紧张状态。很久以来,库尔德人问题以及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组织的结盟,成为土耳其建国以来国内政治面临的巨大挑战,威胁到其生存的根本,也威胁到与其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西方认同问题。

<sup>1</sup> Soner Cagaptay, *Islam, Secul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Turkey*, Routledge, 2006, p. 2

<sup>④</sup> Amkan Nacm anı *Turkey: Facing A New Millenniu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3

## 一、库尔德人问题的历史由来

库尔德人在 1575 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相处还算融洽,因为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传统的、地域的认同与穆斯林认同共同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的认同,民族认同并不起很大作用。传统的库尔德人过着基于家族和部落基础上的自治生活,奥斯曼帝国承认或给予他们较大的自治权,他们也上交一定的税款,同时也为帝国承担兵役任务,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当政时期曾经利用库尔德人镇压亚美尼亚人的反抗。19 世纪中期,为了应对帝国衰落的趋势,奥斯曼帝国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库尔德人的自治权,但此举遭到库尔德人的反抗,帝国的集权化也被迫搁浅。因此一般认为,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产生于 19 世纪中晚期,是在应对奥斯曼帝国加强中央集权的压力下出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在争取土耳其国家独立的过程中两个条约(即从未付诸实施的《色佛尔条约》和取而代之的《洛桑条约》)的签订,对土耳其此后的内政和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耳其政府对这两个条约的解读至今仍影响着该国的内政和外交。关于库尔德人问题《色佛尔条约》规定,库尔德人可在奥斯曼帝国领土范围内的幼发拉底河以东建立库尔德国家。虽然《色佛尔条约》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对于建立库尔德国家这一几成现实的可怕经历,土耳其人至今记忆犹新,并且成为该国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训之一是,库尔德人国家的建立将会极大地损坏土耳其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阻止这一可怕结果的惟一办法就是诉诸于武力;教训之二是,西方人怀有破坏土耳其的主权完整和民族团结的阴谋。这是土耳其人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和从中吸取的教训。<sup>1</sup>而《洛桑条约》中没有任何关于土耳其库尔德人为“少数民族”的条款,从而成为土耳其政治家日后证明自己正确的工具。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凯末尔执政期间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宗教部被取消,伊斯兰教被土耳其主义、现代性和国家主义所代替。土耳其当局拒绝承认基于种族基础上的少数民族,而只承认基于宗教基础上的少数民族,这一点是其独特之处。凯末尔当年认为,土耳其只有成为“单一民族”的同质国家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这一主导思想,对库尔德人问题日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是土耳其人拒绝承认库尔德人为土耳其公民。问题恰恰在于土耳其人强迫库尔德人将自身看作土耳其人。”<sup>④</sup>沉睡中的库尔德意识就是这样被唤醒的。

对库尔德人而言,《洛桑条约》与《色佛尔条约》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反差。而且,一战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土耳其共和国国内的库尔德人与英国占领下的摩苏尔地区的库尔德人同胞被分割开。卡尔布·罗克尔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独立的愿望和脱离土耳其而独立的希望也在库尔德人心中抬头;库尔德人从土耳其违反伊斯兰教教律将哈里发制度取消这件事中,找到了采取行动的借口。<sup>⑤</sup>传统上,库尔德人从宗教和部落的归属中找到了自我认同。然而,随着土耳其从一个基于宗教基础上的帝国向欧洲模式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库尔德人被迫

<sup>1</sup> 参见 Philip Robins “The Overlord State Turkish Policy and the Kurdish Issu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4, October 1993

<sup>④</sup> 转引自 William Hale: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urkish Accession process”, in Ali Carkoğlu and Barry Rubin(eds), *Turkey and European Union*, Frank Cass 2003, p 116

<sup>⑤</sup> 参见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著、[英]乔尔卡·迈克等英译、孙硕人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 500页。

重新确定自己的族裔意识。在 1924 年 3 月 3 日废除哈里发的当天,关于库尔德人的学校、出版物、宗教团体的禁令也在同日颁布,土耳其民族主义取代了人们的宗教感情,库尔德人被称为“山地土耳其人”。这一企图消除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做法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促使库尔德人动员起来反抗土耳其中央政府的控制。于是,凯末尔主义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25 年由谢赫·赛义德领导的库尔德人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土耳其政府敲响了警钟。为防患于未然,土耳其政府在将一些库尔德人强行迁徙到东色雷斯地区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了政教分离的步伐,取消宗教基金部。事实上,土耳其领导人确信,“赛义德领导的库尔德人起义是由英国人煽动而引起的,目的在于表明统治一个庞大的库尔德人居住区的困难,以此阻止土耳其人对摩苏尔地区的企图。……结果,土耳其人认为库尔德人和分裂主义的背后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成为土耳其人的常识”。<sup>1</sup> 1930 年和 1936—1938 年间,土耳其境内又多次爆发库尔德人起义,这一系列事件使库尔德人被认为是土耳其领土完整所面对的最危险的、有组织的威胁。凯末尔政府采用了各种否定和消除库尔德人认同的强制同化措施,包括:禁止传统的库尔德衣服样式,库尔德村庄名字土耳其化,对库尔德语的使用进行多方面的限制等。菲利普·罗宾斯(Philip Robins)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势力稍大,以及周边国家库尔德人的大量存在,土耳其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结合在境内压制库尔德人的自我意识方面也许会获得成功。<sup>④</sup>但历史无情地告诉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高涨,与凯末尔主义打压下国家对社会尤其是对库尔德人认同的打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世俗化的措施,尤其是废除哈里发制度,等于切割了库尔德人最显著的统一属性。土耳其政府接下来采取的土耳其语官方化、取消库尔德语以及在教育中的世俗化措施,进一步刺激了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增长,因为这些措施割断了几百年来库尔德人内部形成的联系,割断了库尔德人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库尔德人需要寻求新的联系。

冷战期间,在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针锋相对的形势下,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暂时沉寂下来。伴随着 1946 年民主制度的实行,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部落领袖也有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双方找到了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实际上,土耳其政府对境内库尔德人的同化政策并没有改变,如“山地土耳其人”或后来创造的术语“东部的同胞”被用来描述库尔德人。由于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被剥夺以及更为根本的生存状态没有得到改善,以致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出现了库尔德人愈发强烈的离心倾向,他们疏离于土耳其的国家制度及土耳其认同。问题的实质在于,库尔德人虽然享有与其他土耳其人同样的权利,但在同化政策下,他们珍视的民族文化无法得到正常发展。

## 二、库尔德人问题的复杂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军方的介入、海湾战争的爆发、复杂的伊拉克局势以及土耳其加入

---

<sup>1</sup> Omer Taspinar *Kemalist Identity in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A Dissertation for Ph.D., 2003 pp. 242 - 243

<sup>④</sup> 参见 Philip Robins “The Overlord State: Turkish Policy and the Kurdish Issu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4, October 1993 p. 661.

欧盟的艰难之旅诸因素与历史纠葛相交织,使库尔德人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库尔德人问题复杂化的首要因素是军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 20 世纪 30 年代镇压库尔德人的反叛后到 60 年代,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居住区相对平静。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土耳其政局动荡、经济恶化,库尔德人的暴力活动也有所抬头。70 年代末,土耳其东部出现了一些试图通过暴力建立库尔德人国家的组织,包括 1978 年成立的由奥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 (PKK)。<sup>1</sup> 鉴于国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土耳其军方于 1980 年 9 月发动了军事政变,接管了文官政府,并实施军人统治达 3 年之久 (1980 年 9 月—1983 年 11 月)。土耳其军人政府对境内库尔德人暴力组织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土耳其军方的监督下出台的 1982 年宪法,乃是对土耳其 1961 年基于人权、自由、民主的宪法的反动。1982 年的土耳其宪法中有一系列特别的条款,以加强对东南部省份库尔德人文化和政治权利的打压。<sup>④</sup> 1983 年,土耳其军方当局还通过了实际上是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的法律。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生活处境愈发艰难,从而激起了他们的新一轮反政府活动。与此同时,土耳其军方在国内库尔德人问题上的过度介入,成为土耳其违反人权的重要证据,引发了西方国家强烈的反土耳其情绪,使土耳其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库尔德人问题成为困扰土耳其外交的重大难题。<sup>④</sup>

无疑,库尔德人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再次大规模爆发与国际形势有关。正如凯尔·克里希 (Kemal Kerisci) 在《库尔德人问题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冷战的结束、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得许多国家重新面对积压多年的多种族和多文化传统的挑战,即政治学家克劳福德·扬 (Crawford Young) 所谓的‘处于上升期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解体’。”<sup>④</sup> 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土耳其政府没有有效地改善境内库尔德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在 80 年代土耳其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库尔德人居住的东南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那里的人均收入只约相当于全国人均收入的 40%。<sup>④</sup>

库尔德人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再次爆发,表明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人政策的失败。而库尔德工人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库尔德国家的行动,则使土耳其国内的“鹰派”占据主导地位。从 1984 年起至 1999 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土耳其军队与库尔德人游击队展开了长达 15 年的军事斗争。其间,土耳其厄扎尔 (Turgut Ozal)<sup>④</sup> 政府曾于 1991 年取消了 1983 年法律中规定的不准使用库尔德语进行广播和出版的禁令,库尔德工人党也迫于美国、英国、德国将其列为恐怖组织的压力而于 1993 年 6 月单方面宣布停火,库尔德人问题似乎有缓和的迹象。然而 1993 年厄扎尔的去逝,使得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问题缓和的局面不复存在。总体上来说,1991—1995 年土耳其政府在解决库尔德人问题上乏善可陈,军方的强硬立场仍在持续。

1999 年奥贾兰被捕后所表现出的忏悔与合作的态度,库尔德工人党对立情绪的相应温和化,库尔德工人党甚至于提出放下武器、停止分裂活动并支持土耳其国内的民主化和多元化的

<sup>1</sup> 参见肖宪、伍庆灵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 年,第 182 页。

<sup>④</sup> 参见 Omer Taspinar *Kemalist Identity in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p. 142.

<sup>④</sup> 参见 Philip Robins “The Overlord State: Turkish Policy and the Kurdish Issu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4, October 1993.

<sup>④</sup> Kemal Kerisci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Lenore G. Martin and Dimitris Keridis (eds.),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MIT Press 2002, p. 277.

<sup>④</sup> 参见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ter Publishers 1991, p. 29.

<sup>④</sup> 1983 年 12 月—1989 年 10 月任土耳其总理,1989 年 11 月 9 日—1993 年 4 月 17 日任土耳其总统。

努力,使得局面有所缓和。库尔德人的合作态度导致了土耳其在政治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军方的干预。但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武装干涉以及随之而来的伊拉克政局的动荡,使得土耳其强硬派所担心的“伊拉克北部将会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国家并且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强硬派因而又主导了对库尔德人的政治”。<sup>1</sup>

库尔德人问题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与土耳其周边的复杂环境相关,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及这些国家对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问题的态度。由于民族矛盾、利益冲突、历史积怨、意识形态分歧等原因,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时非常紧张。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主要包括历史上库尔德人在该国短暂的建国历史,以及伊朗政府对土耳其欲做“中东霸主”的担忧。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尤其严重,该国的库尔德人数量众多,拥有自己的文化权利和教育权利,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令土耳其政府忧虑重重。“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境内不仅是得到宪法承认的两大民族之一,而且还曾经被允许实行自治。库尔德人不仅占伊拉克人口的23%,而且集中在北部山区,素以强悍、难治著称。”<sup>④</sup>两伊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初期,为逃避战争灾难以及战后伊拉克当局对库尔德人实施的镇压,约有10万名库尔德难民逃往土耳其。为了对付库尔德人势力,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允许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力量,这也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用兵。1991年土耳其参加了联合国授权的、由美国及西欧盟国组建的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实施的“安抚行动”,这在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著名政治家埃杰维特(Ecevit)认为,土耳其参加“安抚行动”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土耳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影响。许多人把“安抚行动”称为一只“悬在土耳其头上的铁锤”,还有人甚至将海湾战争后土耳其所面临的库尔德人问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色佛尔问题”的再现。<sup>⑤</sup>在海湾战争期间,库尔德人问题更是令土耳其政府坐立不安,甚至影响到土耳其与其最大盟国美国的关系,足以表明库尔德人问题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的关联。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当时美国对于通过土耳其开辟北方战线满怀信心,但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土耳其的拒绝。土耳其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考虑与对库尔德人问题的担心息息相关——防止库尔德人国家在伊拉克出现。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亦因叙利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和奥贾兰在叙利亚境内的长期活动而非常紧张,土耳其政府为此曾不惜以战争相威胁,以迫使叙利亚就范。可以说,土耳其与周边国家互相打“库尔德牌”是长期的趋势。

库尔德人问题复杂化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欧盟成员国中有大量库尔德移民,他们对母国政治和所在国政治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欧盟及其成员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出于躲避国内的政治迫害,加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大批库尔德人流向欧洲。到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库尔德人数量已经达到50万,其中德国的库尔德人数量最多,为40万人;在法国和瑞典也有一定数量的库尔德人。1989年在巴黎召开的库尔德人会议对库尔德人问题的国际化有着特殊的意义,表明库尔德人以集体的力

<sup>1</sup> Kemal Kirişçi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Lenore G. Martin and Dimitris Kerilis (eds),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309.

<sup>④</sup> 肖宪、伍庆灵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sup>⑤</sup> 参见 T. robe Tibot “U. S. - Turkish Relations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Turgut Ozal Memorial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October 14, 1998. 转引自肖宪、伍庆灵等著:《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第201页。

量出现在欧洲的舞台上。散居在欧洲的库尔德人及库尔德人流亡组织采用各种形式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和欧洲相关国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库尔德工人党看来,欧洲是其最重要的活动舞台。该组织设有“欧洲局”,不仅在欧洲招募游击队员、募捐资金,甚至策划针对土耳其人的恐怖活动。居住在欧洲的库尔德人于1995年创立了“流亡议会”,并建立了电视台,电视信号覆盖了整个欧洲地区。可以说,散居在欧洲的库尔德人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经济、智力、政治和社会上的“生命线”,或者说真正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在欧洲形成的。当1997年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拉克北部追击库尔德游击队时,欧洲各地随处可见库尔德人有组织的抗议和游行。<sup>1</sup>土耳其在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在入盟所涉及的民主、法制、人权等政治标准方面,这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由于库尔德民族和文化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和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一问题也吸引了许多欧洲政府和国家组织的关注,造成了库尔德人问题的国际化,并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sup>④</sup>当1989年欧洲共同体拒绝了土耳其的加入申请时,许多土耳其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如今可谓风向大变,欧洲议会甚至在恐怖组织的名单上删去了库尔德工人党,有人提出议案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自决权利(包括独立),这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对欧盟的批评,甚至认为欧盟试图损坏土耳其的领土和主权。这不仅削弱了土耳其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同时也使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在解决库尔德人的问题上没有多大的进展。库尔德人问题的动向成为观察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晴雨表。

### 三、库尔德人问题与土耳其加入欧盟

欧盟所设定的关于入盟的政治标准(涉及民主、法制、人权等方面),<sup>(四)</sup>与土耳其的政治状况及土耳其基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而对这些政治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产生了冲突。土耳其官方认为,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少数民族”专指非穆斯林的宗教群体,包括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而欧盟委员会认为,根据国际和欧洲的相关标准,土耳其境内还有其他群体符合“少数民族”的标准,这里暗指的就是库尔德人。<sup>¼</sup>欧盟委员会1999年关于土耳其政治发展状况的评价为:“最近几个月来在民主方面取得一些可喜的进步,政府和议会已经通过了一些关键性的法律来规范政治生活、司法系统和保护人权。这些法律的效果还有待估量,但这些法律应该得以继续推行并扩大适用范围,将库尔德人包括在适用对象之中。同时,欧盟委员会希望不要对奥贾兰执行死刑,否则这些努力将功亏一篑。”<sup>½</sup>这一文件充分表明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之后,欧盟希望奥贾兰案件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理,并多次重申欧盟反对死刑的一贯立场。

欧盟委员会2000年关于土耳其政治发展状况的评价为:土耳其签署了国际人权领域的两

<sup>1</sup> 参见 Brtguil Ercan Arğan, *Turkey in Germany*, Routledge, 2003, pp. 121-124.

<sup>④</sup> Kemal Kirisci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Lenore G. Martin and Dimitris Keridis(eds.),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p. 278-279.

<sup>(四)</sup> 1993年在哥本哈根的欧洲理事会上,欧盟要求其成员国资格在政治方面达到具有确保民主、法治、人权和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的制度这一要求。

<sup>¼</sup> 参见 Michael M. Gunter, “Turkey’s Foundering EU Candidacy and its Kurdish Proble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V, No. 1, Spring 2007.

<sup>½</sup> European Commiss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urkey’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 1999,载 <http://www.europa.eu.int>

个重要公约,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然而土耳其政府尚未签署另外一些重要的公约,如《取消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等。关于土耳其的文化权利状况欧盟委员会认为,土耳其最高法院 2000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一项判决显示出一些可喜的变化,如:之前在人口登记时有些名字会被拒绝,而当下如果民法允许,公民可以自由地给孩子命名(包括库尔德人名)。<sup>1</sup> 在语言使用方面,除土耳其语外,《洛桑条约》所规定的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方面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其他群体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这一限制尤其表现在广播、电视和教育方面。在教育领域,除非经国家教育委员会的特别授权,否则除土耳其语外禁止使用其他语言。欧盟委员会认为,任何法律和实践都不能阻止人们享受文化权利,并且人们享受文化权利不受其种族属性的限制。不管土耳其是否愿意承认具有文化认同和共同传统的种族群体为少数民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该国的某些群体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如用母语广播、学习母语或用母语接受教育)处于被否定状态。除此之外,上述公民也没有机会表达对这些事务的观点。考虑到土耳其东南部安全状况的改善,以及土耳其政府开始实施东南部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那里的文化权利的保证显得尤其重要。<sup>④</sup>

2002 年欧盟委员会关于土耳其的评估报告认为:土耳其东南部居民在享受文化权利方面有所进步;大量被错置的口中,约有 37000 人已经重返家园,重返家园和重新安置的工程已经开始。<sup>(四)</sup>

2004 年欧盟委员会关于土耳其政治发展状况的评价为:就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保护少数民族等方面而言,土耳其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得到了进一步修正,已经解除了对库尔德语使用的限制,表现在除土耳其语外,包括库尔德语在内的少数群体的语言已被允许在广播、电视和教学中使用,如库尔德语的课程得到开设及开始播放库尔德语、波斯尼亚语、阿拉伯语等语言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该评估报告在肯定土耳其取得这些明显进步的同时,也指出:该国在文化权利的应用方面仍有很大的保留,在取消区域不平等和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此外,欧盟委员会认为,土耳其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sup>½</sup>

2006 年欧盟委员会关于土耳其的评估报告认为,土耳其仍然无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仍然持保留态度,土耳其政府仍然没有在欧盟委员会关于签订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框架协议上签字。该报告的总体结论是:土耳其在确保文化多样性以及根据国际标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成绩。<sup>½</sup>

从上述所引官方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出欧盟委员会关于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问题明确

---

<sup>1</sup> 但是 2002 年库尔德人被警告如果孩子起一个库尔德语的名字将会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宣传,给孩子起名应该适合于国家的文化、道德和习惯。时至今日,含有 w/x/q 字母的名字仍被拒绝使用。参见 Chris Morris, *The New Turkey*, Granta Books 2005, p. 105.

<sup>④</sup>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urkey'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 2000, 载 <http://www.europa.eu.int>

<sup>(四)</sup>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urkey'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 2002, 载 <http://www.europa.eu.int>

<sup>½</sup>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urkey'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 2004, 载 <http://www.europa.eu.int>

<sup>½</sup>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urkey's Progress towards Accession*, 2006, 载 <http://www.europa.eu.int>

传递出以下信息:第一,“库尔德人”符合联合国、欧盟及相关国际组织关于少数民族的界定,库尔德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应该得到承认。对此,笔者认为欧盟委员会只考虑了“少数民族”的概念和定义,而忽略了库尔德人问题的复杂性及土耳其的立场。第二,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教育权利(包括接受库尔德语教育、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使用库尔德语等)应该首先得到保证。2000年欧盟委员会评估报告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该报告中不再使用“少数民族权利”这个有损于欧、土双方关系的词语,更多强调的是文化权利。但笔者认为问题是欧盟在考虑库尔德人文化权利的同时,没有考虑或不愿考虑土耳其当局的担忧。土耳其当局担忧的是:库尔德人“现在”要求文化权利,等将来要求政治权利时,又该如何应对?库尔德工人党要求建立库尔德国家触动的是土耳其族人的“色佛尔”情结,欧盟又能怎样来说服土耳其族人呢?雷诺·G·马丁认为,提倡库尔德人的认同和文化权利无疑有助于土耳其的入盟之旅,但保守派的担忧在于,承认一个具有分裂性的库尔德认同、允许使用库尔德语自由地表达将会导致东南部库尔德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利,使得邻国有机会对土耳其施加更多压力。<sup>1</sup>第三,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为欧盟所关注。在这一点上土耳其政府与欧盟委员会的立场可能更为接近。面对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一方面指责一些西方国家将该问题扩大化,在处理该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曾任土耳其总理的梅苏特·伊尔马兹(Mesut Yılmaz)<sup>④</sup>就认为,西方在将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冲突“浪漫化”,将恐怖主义者看作“为自治而进行战斗的自由斗士”。<sup>④</sup>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又将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重心转向对库尔德人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库尔德人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合理要求予以关注与解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是否判处奥贾兰死刑的问题上,土耳其政府之所以赞同欧盟的立场,无疑与该国入盟的愿望相关;但土耳其政府更多的考量是,如果奥贾兰被执行死刑,他将被库尔德人作为烈士加以怀念,这会从根本上损害土耳其东南部难得的和平局面,即判处奥贾兰死刑会带来更多的问题。<sup>¼</sup>欧盟对待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的立场亦与它的某种担心休戚相关。贝蒂古·阿古(Betigül Ercan Ağan)就曾指出,土耳其国内政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化、欧洲化,导致了欧洲人的担心:“我们不能让一国的内战打在我们领土上”。<sup>½</sup>

但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欧盟的压力之下,土耳其库尔德人正在获得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库尔德裔作家埃蒂普·波拉(Edip Polat)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入盟。假如欧洲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感兴趣,我们就不会有进步的开始。”<sup>¾</sup>纵观土耳其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欧盟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影响是空前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无论是土耳其的宪法、政党政治格局、选举,还是文化、宗教政策乃至民意,都可以感觉到欧盟影响的作用,更不必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在入盟前景的吸引下,土耳其必须正视欧盟的要求;但限于国内历史和政治的特殊性及库尔德人问题的复杂性,土耳其又处于两难境地。威尔·金里卡认为:“只要少数群体的权利被视为基本权利和基本公正问题,就会产生使它们国际化的压力;同时人们担心一旦将

<sup>1</sup> 参见 Lenore G. Martin and Dinitris Kerilis(eds),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338.

④ 1991年6月—1991年10月任土耳其总理。

④ 参见 Amkan Nachmanj *Turkey: Facing a New Millenniu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1.

¼ 参见 Chris Morris *The New Turkey*, p. 103.

½ 参见 Betigül Ercan Ağan *Turkey in Germany*, p. 3.

¾ Chris Morris *The New Turkey* p. 107.

少数群体的权利当作原则问题,会产生‘滑坡效应’。人们担心的是,尽管现存的少数群体权利可能是无害甚至是有益的,但它们是少数群体权利滑向更危险形势的第一步。”<sup>1</sup>也有人认为,库尔德人问题是西方所放出的一颗烟雾弹,目的在于无限期延缓土耳其的入盟。<sup>④</sup>一方面,土耳其企求加入欧盟有助于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生存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教育权利的获得;另一方面,库尔德人问题与伊斯兰教的复兴对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事业与土耳其的国家认同构成了严峻挑战。总之,土耳其的“欧盟之旅”对该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库尔德人问题将与土耳其的“欧盟之旅”共沉浮。

#### 四、库尔德人问题的出路

库尔德人问题与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实政治,与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土耳其在全球化情况下如何发展,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海湾战争以来,库尔德人问题又与美国对伊拉克未来的设计搅在一起,成为土耳其政治家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影响着土耳其的内政、外交及土耳其的未来。

2003年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运动分子进行了有限度的大释,对库尔德人受害者形成一个赔偿规划。2004年6月库尔德工人党不再遵守停火承诺,库尔德人问题再次升温。2007年土耳其大选中正义发展党再次胜出,居尔出任土耳其总统,从而为库尔德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正义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政府在上一任期中,曾经许诺要解决库尔德人问题,但它们在解决库尔德人问题上已经失败。就其失败的原因 M·哈坎·亚述(M. Hakan Yavus)和尼哈特·阿里·厄兹肯(Nihat Ali Özcan)撰文指出:正义发展党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主要立场为,库尔德人问题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而是在世俗主义和凯末尔主义压力下产生的民族主义。假如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强调共同的伊斯兰教纽带和兄弟情谊,土耳其就能结束这场冲突。问题在于埃尔多安政府对库尔德人问题的定性与库尔德工人党的观念并不吻合,与土耳其共和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也相冲突,导致的结果是正义发展党不能发展和连续执行库尔德人政策,对库尔德人问题的解决乏善可陈。库尔德人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伊拉克因素。哈坎等认为,20世纪80-90年代有两个原则指导土耳其对伊拉克的政策,即:反对库尔德工人党威胁边界安全,防止跨区域的库尔德运动政治化;保护伊拉克境内的土库曼少数民族。到2001年时,土耳其对伊拉克的政策主要有四个原则:(1)保证土耳其军队在土、伊边境地区保持一定的规模,甚至可以进入伊拉克境内对付库尔德工人党武装;(2)防止库尔德人联合体的出现;(3)保护伊拉克境内土库曼族人的权益;(4)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sup>(四)</sup>能否对过去的库尔德人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并有所突破,是正义发展党在新的任期内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下面谈一谈笔者关于土耳其境内复杂的库尔德人问题的一些思考。

首先,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最具决定性的问题是对集体性身份——民族、国家、联盟、种族、部落、阶层、文化、文明——的根源性探索。<sup>1/4</sup>土耳其的“不幸”在于它在地缘上靠近西方而“迷失了”自我,因而遭遇了几乎所有的集体性身份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资本

<sup>1</sup> 威尔·金里卡著,邓红凤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9页。

<sup>④</sup> 参见 Erişin Kalaycıoğlu, *Turkish Dynamics Bridge across Troubled Land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47.

<sup>(四)</sup> 参见 M. Hakan Yavus and Nihat Ali Özcan,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LI, No. 1, Spring 2006.

<sup>1/4</sup> 参见〔挪〕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

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诉诸认同和差异的族群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原质主义的悖论:构成一个族群的原质(语言、肤色、邻里关系、亲缘关系等)早已全球化,因而诉诸原质的族群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建构。<sup>1</sup>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自身的族群意识在西方文化多元主义模式的影响及全球交往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他们要求自身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得到承认与尊重;如果这一要求不能实现,在他们看来实质上是将其强行纳入一个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认同的全体一致的模式。库尔德人作为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少数民族,要求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得到承认,更要求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集体认同得到土耳其政府和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问题在于,这一要求与土耳其政府所宣称的库尔德人为土耳其人并享有土耳其人的一切权利发生了冲突,尤其与土耳其政府一贯推行的土耳其化政策不能相容;而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库尔德人集体权利的诉求会危及土耳其的立国之本。因此,如何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族裔权利体系和保证国家政体的完整与合法性不受到威胁,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其次,土耳其国内由于认同所产生的冲突、危机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游离于故土之外的库尔德人移民的影响。库尔德人由于其特殊的遭遇,西方人对其由“歉意”而生“同情”,他们在西方国家中的游说与土耳其政府所追求的西方认同发生了“撞车”,因而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其一,境外库尔德人移民的认同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土耳其认同,逐渐发展出库尔德人认同、伊斯兰教认同、阿里派认同等民族的、族裔的和宗教的认同。其二,由于西欧国家民主、自由的社会特征,各种认同都可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组织,并在经济支柱下得以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网络和信息的高度发展,使得境外库尔德人移民通过虚拟的空间对土耳其和欧洲国家产生影响。其三,境外库尔德人移民团体在双边及多边关系中加入了移民因素,使得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复杂化。境外库尔德人移民团体在欧洲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以争取欧洲政治界和学术界的精英支持库尔德人的利益。更由于土耳其复杂的认同政治及其在移民团体身上的体现,使得库尔德人问题影响到土耳其外交关系的方方面面。其四,境外库尔德人移民团体传递给欧洲国家关于土耳其的负面形象,直接影响到该国的入盟进程,也影响着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三,解决库尔德人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土耳其政府而言,解决境内库尔德人问题更是艰难,因为该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还涉及地缘因素,更关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民主不会轻易地出现在一个民族主义十分浓重和充满排斥的国度,因此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是稳定和民主的先决条件。<sup>④</sup>同时,少数民族问题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问题,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多语政策或双语政策。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所谓非竞争性的多语政策或双语政策,已经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这种政策其实非常近似19世纪官方文化、国家语言与次级方言俗语之间的关系。”<sup>④</sup>近年来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状况的改善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他们的经济发展也在得到重视,但库尔德人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土耳其政府要想解决该问题还需走相当长的、充满荆棘的路。库尔德人问题是一把“双刃剑”,解决不好对双方

<sup>1</sup> 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页。

<sup>④</sup>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

<sup>④</sup>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190页。

都有害,使之固化和拖延解决都不是可取之策。正确的态度是,民族问题首先是历史问题,这就要求当事各方尊重历史,以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它、认识它。尤其是在全球化下的日益发展的今天,民族问题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这就要求当事各方与时俱进,抓住问题的本质。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之前,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文化、历史相关,只是在 20 世纪基于种族基础上的民族问题才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纯粹基于种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是天方夜谭,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是历史的倒退,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寻求分立为任何主权国家所不容。同时也必须强调,不承认民族的独特性及合理的文化诉求,也是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

总之,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裂主义恐怖活动问题,它关系到如何从政治上来组织一个多族裔、多文化的社会而又不至于危害到政体和国家的合法性。笔者认为,解决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土耳其政府、库尔德人组织、欧盟在这一问题上互相妥协,达成共识;第二,土耳其国内形成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表现为文官政府的稳定,把军队置于文官政府的管理之下,正确对待库尔德人的权利。第三,承认合理的族群诉求,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特别注重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民族问题而言,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新问题总是伴随着旧问题的解决而产生。因此,要想解决库尔德人问题取决于未来土耳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库尔德人内部的变化,取决于土耳其的现代化程度,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结局也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Abstract** The Kurdish group is a minority group 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urkis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 Kurds are perceived as the only minority that could pose a challenge to the integrity and identity of Turkey. The Kurdish problem is not as simple as who is who. The Kurdish appeal is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by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could make the Kurdish issue more and more elusive.

(李秉忠, 讲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062)

[责任编辑:吴家多]